

人

文

中

国

学

系

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◎ 张朋园 / 著



百花洲

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/张朋园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2

(人文中国书系)

ISBN 7-80647-350-5

I. 知… II. 张… III. 知识分子—研究—中国—明清时代

IV. 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8091 号

书 名·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作 者·张朋园

出 版

发 行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)

网 址:WWW.BHZWY.COM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·南昌市胜利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·12.875

字 数·28万

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 3000

定 价 20.50元

ISBN 7-80647-350-5/G.74

邮政编码:330006

电话号码:0791-6894626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自 序/1

第一辑 知识分子

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/3

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/17

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——以胡适与梁
启超为例/40

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——严复、梁启超
的进化观/85

梁启超的两性观——论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约
束/123

梁启超的家庭生活/140

第二辑 识字率、人才、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

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/177

识字率与现代化——读《清代教育与大众识
字能力》/202

发动现代化的主要条件——以云贵地区识字
率的增进(1902~1949)为例/212

人才培植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——以云贵地区为例/242

第三辑 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

预备立宪的现代性/265

近代中国的政治领导阶层/277

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——兼论蜕变中的政治精英分子/290

梁启超的精英主义和议会政治/330

言论界的骄子——从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时代性影响/345

附录 张朋园著述要目/397

自序

1960年美国科学院学术季刊 *Daedalus* 出版一期以“俄国知识分子”为主题的专号,指出由于帝俄落后于西方国家,其知识分子忧心如焚,亟起鼓吹现代化运动,所以俄国才有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巨大变迁。中国同一时期的贫弱处境,如与俄国比较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不禁要问,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觉醒吗?在台湾的少数历史学家受此一思考方向的影响,激起了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。我有幸生逢其时,追随先进,以梁启超为切入点,尝试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,这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开始。

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“现代化”(modernization)的思潮。一个国家要现代化,必须有经济成长、社会繁荣、政治民主。这原是以观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时发展的三大函数,借用过来观察19、20世纪中国衰弱的究竟,再好不过。1972年我与一群理念相近的学者承担了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”计划,担任计划主持人之一,自此我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,从思想史开始转向政治社会经济史。虽然经济史是我的弱点,着墨不多,但在政治社会史方面则扩大了研究的视野。

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,一朝投身进去,如行山阴道上,趣味无穷,有应接不暇之感。我对此两个主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题有些许认识,是在学习中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。早期为了知识分子的定义,我在一种辞书中查得,他们是“关心社会荣枯的人”,这是从责任感或角色关系去下定义。四五十年来为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著作不胜枚举。在专业化分门别类的今天,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,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,Edward Shils 就是从这个宽广的视野去看知识分子的。他说,凡是有专精学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。^①但是 Charles Kadushin 所下的定义则较为严格。他说一个行道中的专业人员,如果整天关在研究室中读资料、搞实验,他只是一个专家;惟有他同时关心社会的荣枯,才是一个知识分子。举例而言,研究核子的专家走出了实验室去参加反核运动,即可称之为知识分子。^②

探讨知识分子,许多学者都有一套理论。最常见的是“启蒙”说。中外古今的启蒙运动大半皆为知识分子所倡道,如果没有知识分子,恐怕人们今天仍是懵懵懂懂的。^③以梁启超(1873~1929)为例,他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者,我的三本相关著作,似皆可用启蒙主义涵盖贯穿。^④

再举一个例子。严复(1854~1921)与梁启超一再反复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,提出进化论的“弱肉强食,适者生存”是一个铁

① Edward Shils, *Th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s and Other Essays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72).

② Charles Kadushin, *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s* (Boston: Little Brown, 1974) p.30

③ Ron Eyerman, *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: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ociety* (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1994), p.75; Jeffrey C. Goldfarb, *Civility and Subversion: Intellectual in Democratic Society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p.28

④ 张朋园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》、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》、《梁启超与民国政治》。本书涉及作者著述,著作版本及论文刊载情况,参见本书附录“张朋园著述要目”,在内文中不一一庄出。下同。

律,是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动力与口实,所以中国才受到列强的欺侮而濒于被瓜分的边缘。但国人不必因此而恐惧自卑,亦惟有接受进化论,自强图存,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。我在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》一文中举证进化论一体的两面:帝国主义者以之向外侵略,吾人得之奋袂而起。严复、梁启超鼓励国人奋发图强,力挽狂澜,其用意在此。

“疏离”说是1960年代最流行的理论,尤其是研究帝俄晚期的知识分子,如果不运用“疏离”观念去观察,将难以说明19世纪俄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转折历程。著名的俄国史学家 Richard Pipes 说,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后三代,第一代鼓吹现代化,要求改革农奴制度;第二代不满沙皇的无动于衷,走上了疏离的道路;第三代则掀起革命,俄国因之大变。^①

改革、疏离与革命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三部曲。世界各国的革命几无役不有知识分子参与。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,本书有一篇短论,略窥其概。

我的早期研究,几乎完全接受了“启蒙——疏离——革命”三阶段说。梁启超三十一岁之前的言行就是如此的。起先,他那“常带感情之笔”,一面倡言权利及自由思想,一面要求清廷维新,图存图强。及至要求得不到预期的回应,梁氏痛斥清廷颞顽无能,疏离感由然而生,他要革命。但三十一岁以后的梁启超又退回到改良式启蒙主义的立场,认为中国只宜于按部就班的变革,而非激烈的流血革命。他从激进回归温和,改而倡言现代化,认为惟有现代化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。

俄国大革命经过三代催化而遽变,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三代转型的过程。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,中国一再失败,知识分

^① “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”, *Daedalus*, Summer, 1960.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子受此创巨痛深的刺激而亟起求变。从魏源(1794~1856)至黄遵宪(1848~1905)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代,他们提出了器物及制度的改革观念。梁启超和孙中山(1866~1925)可以说是第二代,他们有了疏离感,即将走向革命。当梁启超徘徊于革命与否的歧路时,黄遵宪告诫梁氏不可逞口舌之快,一味鼓吹革命,当知革命容易,建设困难。梁启超与黄遵宪为忘年之交,他们的交谊亦师亦友。黄对梁的劝告深有影响,梁因此而由激进转趋温和。本书《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》一文有较详细的讨论。

如果梁启超是第二代,胡适(1891~1962)无疑是第三代。胡适留学美国期间(1910~1917)对梁启超推崇备至,他甚至于将中国的前途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,认为惟有梁氏归而执政,中国才能救得过来。及至胡适学成归国,且暴得大名,有意无意之间,竟与梁启超竞争起来,他要在学术上超越梁氏,甚至于社会地位也要比个高下。梁启超曾为言论界的骄子,学术上有舍我其谁的气概,自难相让。因此两人常不免过招较量,企图压倒对方。所幸中国人的传统伦常尚存,兄友弟恭,梁、胡之间始终维持良好的友谊关系。我在《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》一文中将胡、梁的故事原委,一一叙述,并有所讨论。

近年来知识分子的私生活甚受注意,历史上某些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大受责难。^①我对梁启超的家庭生活及两性观也有所讨论,这是受最近史学研究趋势的影响。梁启超的家庭生活堪称严肃。我有一个偏见,议论知识分子,不能因人而废言。我甚钦佩梁启超给予子女的爱的教育,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。

Charles Kadushin 将知识分子分为两个类型:知识型 (cleri-

^① Paul Johnson, *Intellectual* (N. Y.: Harper and Row, 1988)

sy)、革命型(revolutionary)。^①借用过来,我认为黄遵宪、严复、梁启超、胡适皆为知识型的知识分子,他们一生以启蒙主义为己任,发现问题,提出解决问题之道,苦口婆心,有如传教士一般。知识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温和,或者不如革命型者轰轰烈烈,但他们的所思所见启迪大众,引领社会,期望欣欣向荣,长治久安。

以上系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观察,下面要谈谈现代化研究。

“现代化”是个美丽诱惑人的名词,人人希望自己已经现代化,国家已经现代化,尤其 19、20 世纪之交中国的国运衰弱,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,非此不可。然而“现代化”一词是有特殊含义的。20 世纪初年,已经有人使用这个名词,是要求赶上时代的意思,并不像 50、60 年代有着特殊的含义和要求。我们的确需要现代化。我们问为什么现代化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?儒家思想笼罩着中国社会两千余年,根深蒂固,是不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?这个问题令人困惑极了。我们实在不愿意说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,但是 20 世纪 50、60 年代 Max Weber 的学说左右着学术界,他从原动力的方向去解释,谓儒家缺少新教式奋发进取的精神,所以不能现代化。但是到了 70 年代,“东方四小龙”出现了,学术界随之摆脱了 Weber 的影响,一反而言儒家亦有相似的原动力,否则“四小龙”不可能出现。换句话说,儒家思想是利于现代化的。前后两极端的说法,叫人更为困惑。儒家思想究竟利不利于现代化?为了客观起见,我与我的学生一起读儒家原典,我们发现儒家思想中有某些说法是有助于现代化的,有些则不然。举例说:“安贫乐道,安步当车”,实是过于消极的思想。但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则是非常积极的。我们的结论是,儒家思想是否利于发展的问题,

^① Charles Kadushin 前引书, p. 347。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恐怕学术界将永远争论不休。请进一步参看本书《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》一文。

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”是一个两阶段的研究计划。我们将全国分为十七个区域,由于人手的限制,第一阶段十个人参加,研究广东、闽浙台、江苏、上海、山东、直隶、东三省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地区;第二阶段七人参加,研究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甘、广西、云贵等地区。我担任湖南和云贵地区研究。^① 中国在西力冲击下,的确慢慢地在改变中。有一位学者用动员(mobilization)观念讨论现代化初期进展,他列出七个观察的指标,包括:人民对于新事物与大众传播的接触、居住处所的改变、识字率、城市人口、非农业人口、国民所得等。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方法,我曾经利用这些指标写了一篇短文比较早期内地与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的现代化,^② 我们的区域研究大致就是利用这些指标函数作为观察方向。

以识字率作为例子说明,识字率与现代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识字率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,必然会开始发展走向现代化,否则,必定还是死气沉沉难以启动。Evelyn Rawski 所著《清季教育与大众识字能力》,说中国在 20 世纪之前的识字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,她对中国的现代化保持乐观。我用 Rawski 的方法观察云贵的识字率,发现清末民初之际,该地区的识字率只有百分之六、七,令人惊讶。云贵缺乏动力是很明显的。云贵的贫穷与难以现代化的原因,识字率低,至少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。

^① 张朋园《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:湖南省》;《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:云贵地区》(即将出版)。

^② 《中国现代化的过去与现在》,《中国时报》,1979年2月5日。

最后谈谈政治参与。有一位政治学家说,如果现代化中有一个突出的事件,那就是“政治参与的爆发”(the participation explosion)。^①他指的是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之逐步实现。Samuel Huntington 说,民主政治一波又一波地往前推进,现在已过了第三波。^②中国早在 20 世纪初年就试图引入西方的议会政治,已经注意到了政治参与的问题。近现代的中国先后有过四次议会选举:1908~1909 年,1912 年,1917 年,1947~1948 年。虽然这些选举都不十分成功,但精英与大众初步尝到了政治参与的滋味,可以说民主政治的火花在中国爆发过了。我有一本书对这四次选举详加介绍分析。^③本选集中纳入三篇论文,谈到相关的问题。

议会政治突显的问题有两方面:一是人民大众的参与,一是精英素质的提高。依据我个人的观察,议会中的议员都是精英分子(elites),他们有义务为人民大众讲话,谋取福利。当然只有精英分子才能看得见问题,提得出现代化的建言。本书第三辑所收论文五篇大致都围绕着精英问题,梁启超的议会论更是受到精英主义的影响。精英分子素质的提高,实为议会政治提高的基本条件。

综合上述,我有一个基本论点:现代化就是现代性(modernity)与传统(tradition)的交替过程。我以 1905 年(光绪三十一年)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分水岭,原因是当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了。科举制度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,奠定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儒家

① Gabriel A. Almond, Sidney Verba, *The Civic Culture* (Boston: Little Brown, 1963)P. 2.

② Samuel Huntington, *The Third Wave: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* (Norman: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, 1991).

③ 张朋园《中国近代的国会选举》(即将出版)。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传统。一朝将之废止,全国震撼,精英分子顿失了安身立命的凭借。此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决策,中国文化同时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。当然随着西力冲击而来的现代化不始于1905年,现代性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,对中国的文化起了催化作用。我用两个契形表示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,一面是传统在消退中,一面是现代化在进展。但传统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,现代性也无法完全取代传统。这一个交替的时空过程可能是漫长而持久的。本书180页的绘图只是一个示意,不知读者同意否?

岁月催人老,四十年的学术生涯,我仅仅在两个研究领域中蜻蜓点水般越过,认识有限,收获更是有限。研究知识分子,只对温和型者稍有观察。回想我年轻的时候,曾经一度向往激进主义,但我接触清末民初温和型知识分子之后,不知不觉地转向同情他们的渐进主义。证之近二十余年中国的发展,似觉温和型知识分子具有远见而且甚为理性,不免叹息百余年来人人急欲超越前进,却走了崎岖迂回的道路。中国必须强盛盖无疑问,亦惟有现代化可以达成此一目的,而现代化必须在秩序及安定中获致,似为铁律。

本书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鼓励和协助,才得以与读者见面,书名也是他建议的,感激不尽。

张朋园于南港

2002年2月28日

第一辑

知识分子

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

一 知识分子释义

“知识分子”一词,中文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系 *intelligentsia* 的翻译,原指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一个原型阶级,因此又有译为“知识阶级”者。这个专指一群特殊人物的名词,于 1860 年在俄文中首次出现,以后传播世界各地而被广泛使用。它的含义是城市中的一个新层次,也可以说是城市精英分子(*urban elite*)。但是各种译文多未尽符合原意,例如德文,学者、专家、知识分子诸词可以互换使用,英美则谓劳心者(*non-manual workers*)为知识分子。中国历史上原有“士大夫”一词,意义与“知识分子”相近,然译者弃而不用,可见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人显然有不同之处。

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层,其条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,不以手艺或劳力为职业。假定以二分法区别社会为传统与现代,知识分子是进步的,是促进现代化的精英分子,他们将传统带到现代化。不过,在传统到现代化的进程的初期,商业阶层尚未兴起,是其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基础不同的现象。具体而言,知识分子是包括教师、学者、士绅、中学以上学生、自由职业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人士(如作家、艺术家、律师、新闻记者等)的代名词。

知识分子既与现代化有关,在此必须将现代化的定义略为说明。“现代化”是一个抽象名词,具体的说法盖为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。所谓发展和变迁,在社会,是循着西方先进国家的轨迹,求得工业化(包括城市化),职业的衍分,个人社会地位有上下左右移动的可能性(传统社会地位,个人属于某一阶层,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性),教育发达,人民普遍识字,知识水准提高;在政治上,由专制政体进而为代议制度,经济从放任走向国民福祉。^①归纳起来,现代化就是选择性的制度变革,在变革中可能放弃了一部分传统,保留了一部分被认为是精粹的;保留多少,放弃多少,视社会的求变因素而定。

知识分子既是现代化的精英分子,对于“精英”(elitism)一词亦当有所界说。一位社会政治学家说:平等社会中并不强调上层与下层有地位上的悬殊,但是在精英社会(elitist society),其握有地位者便受到一般人的尊敬,无论是商业界、知识圈子、政府机构中都是如此。上层与下层之别,是上层地位的受到尊敬,上层领导下层。当然没有任何社会真正运用这种理论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地位,也未尝真正有这种社会发生,但是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有类似实质的存在,所以用二分法来讨论社会结构的学者,便有精英之士和老百姓的区别。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受尊敬的,所以通常都把他们列入精英阶层。^②

知识分子是新观念的倡导者,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迟缓的国家特别受到尊敬和重视。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,便必须讨论知识分子的观点。换言之,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是相提并论的。

① Reinhard Bendix, *Nation-Building and Citizenship* (New York, 1964), p. 5

② Seymour M. Lipset, *The First New Nation* (New York, 1963), pp. 211 ~ 212.

此不仅在 19 世纪的俄国如此,东方和南美诸国亦复如此。发展中的国家,其知识分子大同小异。史华慈(Benjamin Schwartz)比较 19 世纪中俄的知识分子,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这两个国家面对西方的社会,都有一个长久的传统:在俄国,一方面是大量的农奴,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九;另一方面是专制政治,得贵族的支持。在中国,虽无农奴,贵族比例亦少,但人口百分之八十为文盲,生活在农村社会,情况几与农奴无异,而中国的政治也是专制的。^①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,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。不过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自教士和士绅阶级,农奴中绝难产生知识分子。中国则不然,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来自士绅阶级,而士绅多以世代务农自诩,事实上知识分子亦有起自田间者。科举制度废止(1905)之后,新式教育兴起,留学风气大开,知识分子的结构便改变了。

二 知识分子的结构

本文以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为讨论范围,虽然仅仅是二十余年的时间,却是中国变迁最大的时代;时代变迁很大,知识分子的变迁亦很大。戊戌变法、立宪运动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。这四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,推动这四件大事的知识分子,思想和结构也是有区别的。

戊戌变法(1898)是西洋思潮影响下的改革运动,推动此一运动的人物几为清一色的士绅阶层。据估计,领导人物有传可

^① Benjamin Schwartz, "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: A Tentative Comparison", in Richard Pipes (ed.) *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* (New York, 1961), pp. 164 ~ 181

◆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

考者四十八人,其中进士二十八人,举人八人,贡生三人,生员二人,无功名而有捐纳官位者四人。他们的西方知识得自一些翻译作品,或因与西方人士接触,或游历西人的殖民地和通商口岸,得到一些一鳞半爪的印象。可说所知有限,甚而一知半解。真正到过西方的(五人曾游欧美,一人游日本),又因语言文字的隔阂,未必能有深入的观察。能提出变法观念的不过二三人,但并不在变法运动的中心(如马建忠、严复)。或因本身已进入统治阶级,缺乏积极进取的观念,虽有所知,亦保留而不敢流露。如黄遵宪,尝谓太平世在民主,但不敢明言。^①

戊戌变法之后,接着有立宪运动(1906~1911)。立宪派人的背景,以咨议局(1909年成立)和资政院(1910年成立)的一千六百余名议员为例,出身亦大多来自士绅阶级。百名议员中九十一名具有传统功名,其中进士占百分之四点七,举人一十九点一,贡生四十三点一,生员二十四。^② 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当百分之二十。

与立宪运动同时的革命党,亦多由知识分子组成。以同盟会为例,该会成立时(1905)基本会员七十人,一年之后发展为六千余人,辛亥年已超过二万人。其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,具有传统功名者比例甚微。有传可考之革命党人三百二十八人,其中有传统功名者,进士二人,举人六人,贡生二人,生员三十三人。^③

五四时期(1916~1921)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

① 《东海公来简》,《新民丛报》第十三号(1900年7月),55页。

② 张朋园《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》,《思与言》五卷六期(1968年3月),17页。

③ 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《革命先烈先进传》(台北,1965)。